

杨耕作品系列



In Defence of Marx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为马克思辩护

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

杨 耕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杨耕作品系列



In Defence of Marx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为马克思辩护

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

杨 耕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 / 杨耕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6

(杨耕作品系列)

ISBN 978-7-303-22550-7

I. ①为… II. ①杨…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6948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WEI MAKESI BIANHU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 mm×980 mm 1/16

印 张：34.25

字 数：485 千字

版 次：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5.00 元

策划编辑：杜松石

责任编辑：王 宁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写在前面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杨耕作品系列》，收入了我的四部著作，即《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

《为马克思辩护》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为理论背景展开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并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的成果重新阐释已经成为“常识”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深入探讨被忽视、被遗忘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系统论证马克思有所论述但未充分论证，同时又契合着当代重大问题的观点，并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的创立使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从“认识世界何以可能”转向“改变世界何以可能”，从而实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怀双重关怀的统一。

《危机中的重建》以近代思辨的历史哲学、现代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为理论背景，从历史哲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唯物主义历史观，明确提出历史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历

史观的理论生长点，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双重职能。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应以马克思的实践观为基础，在深化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上强化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从而使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统一。

《重建中的反思》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新的阐释，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实践为出发点解答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新的哲学空间，即一个自足而又完整、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图景。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一种内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的“批判的世界观”，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的“批判的哲学”（马克思）。

《东方的崛起》则力图把真实的描述和深刻的反思结合起来，把哲学思维力量的穿透力和哲学批判精神的震撼力结合起来，透视一个古老而又饱经磨难的民族重新崛起在世界东方的秘密，并从理论上再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再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艰难性，再现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从而展现社会主义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上实现世纪复兴和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的辉煌远景。

这四部著作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高屋建瓴，但也绝不是浅滩上的漫步。这四部著作是我40年来上下求索的理论结晶，是我重读马克思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从不同的维度反映了我的哲学研究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集中体现了我所追求的理论目标——求新与求真的统一；我所追求的理论形式——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我所追求的理论境界——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所以，我以《杨耕作品系列》（以下简称“作品系列”）的形式把这四部著作集结出版，力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思路。当然，也许此路不通，但“谁若为我们指出了走不通的道路，那末他就象那个为我们指点了指点了正确道路的人一

样，对我们作了一件同样的好事”(海涅)。

“作品系列”的主题，就是在重读马克思的基础上重释马克思的哲学，展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创始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就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重读马克思，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理论体系。离开了这一前提，我们就会犯演丹麦王子而没有哈姆雷特的错误。一幕没有主角的戏是无法上演的。我们既不能以“原教旨主义”，即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列宁)脱离了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德里达)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死而不亡”。马克思“死而不亡”，马克思仍然“活着”，并与我们同行。

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的哲学产生于19世纪，距今170年，已经过时。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不是真理。“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既有最新的、时髦的谬论，也有古老的、千年的真理。阿基米德定理创立的时间尽管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造船业无论多么发达，也不能违背这一定理。如违背这一定理，造出来的船无论多么现代，多么“人性”化，也无法航行，即使航行也必沉无疑。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科学，就必须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正是由于所关注的问题深度地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我同意并赞赏萨特的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我同意并赞赏福柯的观点，即在当代，历史研究要想超越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是不可能的；我同意并赞赏詹姆逊的观点，即马克思的哲学是当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它“让那些互不相容，似乎缺乏通约性的批评方式各就其位，确认它们局部的正当性，它既消化又保留了它们”；我同意并赞赏海德格尔的观点，即“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萨特、福柯、詹姆逊、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评价真诚而公正。在当代，无论是用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还是用新实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或是用现代新儒学、后现代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都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在我看来，这种对抗犹如当年的庞贝城同维苏威火山岩浆的“对抗”。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这就是，“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一个刚刚中学毕业、年仅17岁的青年，似乎在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实际上是为一种新的事业竖起了凯旋门。这是一个崇高的选择，这一崇高的选择决定了马克思的一生。

马克思不是“出世”的“沙漠的高僧”，而是“入世”的思想家，是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完美结合；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远离现实的“书斋里的哲学”，而是深入现实的改变世界的哲学，是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高度统一。对于这样一位从特里尔小城走出来的世界伟人，对于这样一位出生于显赫的犹太家庭而又关注着“全世界受苦人”的世界伟人，对于这样

一位为了写作《资本论》而“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意志坚如磐石的思想伟人，对于这样一位用自己的思想和事业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历史伟人，我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我把这套小小的“作品系列”献给这位世纪伟人。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礼轻情意重”。

在“作品系列”出版之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挚友、兄长和领导袁贵仁教授。每当我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每当我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况时，他总是已经静静地站在那里在等着我，为我指出方向，给我智慧和力量。袁贵仁教授无私的关爱，为我的学术研究和人生发展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我从心里，从流动的血液里感谢袁贵仁教授。我深知，要是没有你，我把“栏杆拍遍，无人会”（辛弃疾）。

在“作品系列”出版之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导师汪永祥教授、陈先达教授。汪永祥教授把我领进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汪永祥教授的学术引导力引导着我走向哲学研究的“高速公路”；陈先达教授把我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不嫌我愚笨让我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陈先达教授的思维穿透力引导着我走进马克思，“走向历史的深处”。我从心里，从流动的血液里感谢汪永祥教授、陈先达教授。我深知，“要是没有你，我在这里就陷入一片虚无”（《天真汉》）。

在“作品系列”出版之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挚友陈志良教授。陈志良教授宏大的叙事能力引导着我在一个新的思想平台上展开了哲学研究。我忘不了我的这位挚友。此时此刻，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志良兄，你在“天堂”一切可好？！

在“作品系列”出版之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朋友和亲人，没有他们的友情和亲情，我不可能成长。同时，我也想起了由于种种原因对我产生误解甚至“敌视”的人，没有他们的误解和责难，我不可能成熟。对于我来说，友情与亲情、误解与责难、委屈与磨难都是一笔财富，一笔不可缺少的财富。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从1978年2月走进安徽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40年了，从“形式”到“内容”，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都有很大的不同了，但在这种种的变化中又有不变，在这种种不同中又有共同。这种“不变”“共同”就是我对哲学的“钟情”。哲学已经融进了我的生命活动之中，成为我书写生命的方式。哲学教会了我如何实现自我发展，懂得我们都是集体性的人物，因而力图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自我发展；哲学教会了我如何面对“过五关”与“走麦城”，懂得“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才能学会走路”(马克思)，因而“我把命运的摇晃都当作奖赏，依然在路上”(《摆渡人》)；哲学教会了我“荣辱不惊”“波澜不惊”，懂得“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王勃)，因而痛到肠断忍得住，屈到愤极受得起；哲学教会了我“看破红尘”“看透人生”，懂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因而在“向死而生”中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记得在《为马克思辩护》(第三版)的“后记”中我说过，“《为马克思辩护》第三版出版之后，我‘渴望思想平静’”。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过去了8年，我的思想却没有平静，相反，仍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有时甚至出现困惑与迷茫。这使我想起了诗人汪国真的诗句：

有时 感觉自己
真像一只孤独的大雁
扇动着疲惫的翅膀
望天也迷茫 望水也迷茫
只是从来不想改变初衷
只是从来不想埋葬向往

杨 耕

2018年5月于北京

序 言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逝世之后被“神化”的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释迦牟尼不用说，即使孔子也被请进庙里，像神一样被供奉起来，享受春秋二祭；同时，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逝世之后被“矮化”的现象在历史上也不罕见。两极相通，一个思想家被“神化”到一定程度便会被“矮化”，所以，同一个思想家逝世之后，在一个历史时期中被“神化”，在另一个历史时期中被“矮化”，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的。

马克思似乎也遭遇着同样的命运。在社会主义凯歌前行的年代，马克思一度被“神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了，似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绝对真理体系。可问题在于，自诩为包含一切问题答案的学说，不一定是科学，而可能是神学。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以绝对真理自诩的思想体系，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可能兴盛于世了。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的年代，马克思又被“矮化”，甚至“丑化”了，使得马克思在思想文化的论争中不仅没有成为“原告”，反而或明或暗地成为“被告”，其“形象”任凭“原告”的言说随意涂抹。作

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不能不为“缺席”的马克思辩护。所以，本书定名为《为马克思辩护》。

辩护就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马克思“辩护”，“事实”就是马克思的文本，“准绳”就是当代实践。在我看来，为马克思辩护必须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重读马克思文本，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我的全部论著都是重读马克思的结果，或者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所以，本书的副标题为“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

当然，我注意到，对马克思哲学的争论持久而激烈。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引起争论，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这样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马克思的“形象”在其身后处在不断地变换中，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于是，我开始重读马克思，并企望走进马克思。

重读马克思并不是无事生非或无病呻吟，而是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个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或巨大的社会变迁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或理论局限，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20 世纪的历史运动、苏联的衰败解体、资本的自动延伸、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困境，使得哲学家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重新关注马克思。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重读马克思再次成为“热点”，实际上，“重读”是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黑格尔重读柏拉图，皮尔士重读康德，歌德重读拉菲尔……“风流犹拍古人肩”。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后人不断重读前人的历史。所以，哲学史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伟人如此，我这个普通人更应这样了。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马克思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史、西方哲学史，再到现代西方哲学，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其意在于，把马克思哲学置放到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去研究。我以为，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哲学的过程，把握马克思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何处以及何种程度上被误读了；只有把马克思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中去研究，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只有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才可知晓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局限和伟大所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语），为什么在当代“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是一个错误”（德里达语）。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涉猎了社会主义思想史，同时进行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从马克思哲学的创立过程看，马克思对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都进行过批判性研究和哲学反思，不仅德国古典哲学，而且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英国和法国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都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来源；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容看，马克思的哲学是在阐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生成的，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既是马克思哲学的终极目标，又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高原则；同时，马克思的经济学不仅是经济理论，而且是资本批判理论，它所揭示的被物的自然属性所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思维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马克思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

在这样一个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的面前便矗立起一座巨大的英

雄雕像群，我深深地体会到哲学家们追求真理和信念的悲壮之美；我的脑海便映现出一个多维视界中的马克思，我深深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被人们评为“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首先关注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是如何理解哲学的，或者说，马克思的哲学观是什么？

按照西方传统哲学的观点，哲学“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全部知识的基础”和“一切科学的逻辑”，是“最高智慧”。可是，在现代西方人本哲学看来，哲学关注并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精神的焦虑”“信仰的缺失”“形上的迷失”“意义的失落”和“人生的危机”；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看来，“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石里克语）。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就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霍克海默语），“理智地消除甚至推翻既定事实，是哲学的历史任务和哲学的向度”（马尔库塞语）。

这一特殊而复杂的现象印证了黑格尔的见解：“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的确如此。作为同原始幻想相对立的理论思维形式，哲学是同科学一起诞生的。然而，对于什么是哲学，又从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不存在为所有哲学家公认的哲学定义。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派别的不同哲学家对哲学有不同的看法，不仅哲学观点不同，而且哲学理念也不同。哲学是什么、哲学的位置在哪里因此成为最折磨哲学家耐心的问题，由此导致哲学“总是被迫在起点上重新开始……从头做起”（石里克语）。

在我看来，这是科学史、思想史的正常现象。科学史、思想史表明，任何一门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外，往往还要回过头去重新探讨如自己的对象、性质、内容和职能这样一些对学科的发

展具有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哲学不仅如此，而且更为突出，用石里克的话来说，这是“哲学事业的特征”。对于哲学而言，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规定，也不可能形成超历史的、囊括了所有哲学的统一的哲学。

从根本上说，哲学的位置是由实践活动的需要决定的；从直接性上看，哲学的位置是由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的，不同时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哲学具有不同的位置。古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古代哲学的“知识总汇”这一位置；近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近代哲学的“科学的科学”这一位置；现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哲学分化为科学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流派。其中，分析哲学着重对科学命题的意义分析；存在主义哲学注重对人类存在的价值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哲学要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要关注自然科学。哲学不能脱离自然科学，哲学水平往往依存于自然科学水平。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本无意向哲学献媚，可往往又决定了哲学的面貌。“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恩格斯语）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认为，随着自然科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人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就“变得枯燥乏味了”，此时应当改变哲学的这种存在形态。可哲学又不同于科学，哲学不仅讲规律，而且讲意义，即着眼于规律性判断对人的价值和意义；哲学不仅要关注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思考，而且要把握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以至审美关系。哲学不是李尔王，绝不会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我们应当注意，自然科学的内容是共同的，它没有个性，也不能有个性；哲学不仅包含着共同的内容，而且凝聚着哲学家个人特殊的人生体验，如同文学一样，哲学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黑格尔哲学不同于柏拉图哲学，康德哲学不

同于苏格拉底哲学，孔子哲学更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如此等等。

哲学要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更要关注政治。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因此，哲学要关注“时代的迫切问题”，哲学的批判要“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

这一见解正确而深刻。哲学不等于政治，哲学家不是政治家，有的哲学家想方设法远离甚至脱离政治，但政治需要哲学。没有哲学论证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逻辑说服力，缺乏理念和精神支柱，很难获得人民大众的拥护。我们不能把哲学政治化，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哲学的政治性。实际上，哲学不可能脱离政治。相反，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特定的政治背景，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含政治，总是具有这种或那种政治效应，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哲学既离不开政治，也离不开政治的后果。

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追求的既是真理，又是某种价值。从根本上说，哲学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并透过一定的认识内容而表现出来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它总是体现着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明快泼辣的法国启蒙哲学是这样，艰涩隐晦的德国古典哲学是如此，高深莫测的解构主义哲学也不例外。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解构主义通过解构既定的话语结构挑战既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结构。哲学与时代的统一性首先是通过它的政治效应来实现的。哲学家既要有自觉的哲学眼界，又要有敏锐的政治意识，才能把握时代精神。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为历史服务”的批判理论。

哲学具有历史性，同样，哲学要“为历史服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

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这就是说，哲学必须具有批判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只有在“批判旧世界”中才能“发现新世界”，只有“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才能引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从而“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换言之，哲学是通过批判“为历史服务”的。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学说。

无论哲学是把目光投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转向人与社会的关系，归根到底，关注的仍是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显示的仍是人的自我形象。所以，马克思认为，哲学应围绕着现实的人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全部内容，“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如果说宗教是关于人的死的观念，是讲人生前如何痛苦、死后如何升天堂的；那么，哲学则是关于人的生的智慧，是教人如何生活，如何生活得有价值、有意义的。哲学总是熔铸着对人类生存本体的关注，对人类发展境遇的焦虑，对人类现实命运的关切，凝结为对“人生之谜”的深层理解与把握，因而构成了人的“安身立命”之根和“安心立命”之本。这就是说，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人生观。

实际上，人生观是个哲学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医学、生物学、考古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等都不可能解答人生观问题，倍数再高的显微镜看不透这个问题，再好的望远镜看不到这个问题，亿万次计算机也算不出这个问题……人生观也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因为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必然渗透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生的不同看法必然包含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饮食男女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却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千古绝句表明，人的生与死本身属于自然规律，而生与死的意义却属于历史规律。英雄与小丑、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就是如何处理人与历史规律的关系。

系。这就是说，人生观并非仅仅是一个对待人生的态度问题，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人生观就是世界观。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不仅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不能仅仅“为了认识而注视外部世界”，相反，“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形式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从而使哲学这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换言之，哲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因此，哲学的理论批判必须“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即和实践批判结合起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语）马克思与他所批评的“哲学家们”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哲学家们”把存在看作某种超历史的或非历史的存在，以追问“世界何以可能”为宗旨而解释世界；马克思则把存在看作历史的存在或实践的存在，以求索“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为宗旨而改变世界。

这就是马克思对哲学的新理解。这种新理解必然促使马克思建构一种新哲学。重读马克思，使我认识到，马克思终结了传统哲学，开创了现代哲学，马克思的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

从根本上说，传统哲学就是“形而上学”。从历史上看，形而上学在对世界终极存在的探究中确立了一种严格的逻辑规则，即从公理、定理出发，按照推理规则得出必然结论。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标志着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的形成。然而，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家们把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日益引向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存在，成为一种抽象的本体。因此，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科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社会发展“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马克思语），西方哲学掀起了反形而上学的浪潮。孔德和马克思同时举起了反